

迷上邱岳峰,那是曾经的我,一个为当一名配音演员而做十二年梦的“梦想者”所为。请想象我那时的情景:一张薄薄的说明书上,若标有邱大师的名字,迅即会心跳加速、热血沸腾。我那时根本模仿不了他,但看完他配的片子便会下意识地学着他的腔调喃喃自语,陶醉不已。也正是在连看数遍邱老师和李梓老师主配的苏联影片《白夜》之后,我下定决心走配音之路。

以上只是此文的引子,切不要以为,这回我又在这方面大肆“开掘”。我是郑重想提一下最近应邀去天津卫视参加的活动。天津这几年变化之大,尤其是海河两岸,实出我的想象之外。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,天津的中老影迷朋友以及年轻的配音爱好者,在今天还把配音艺术看作生活中的大享受,津津乐道、念念不忘的便是上译厂的头号大师邱岳峰,其迷恋和推崇程度可谓无以复加。见到他们这种特殊状态,除深感惊讶之外,便剩下满满的感慨。他们对邱大师格外亲切,是否也因为邱老师是从天津舞台辞别话剧演出而加入上译厂的呢?这样一份盛情,令我备受鼓舞和启示!

我想,我们对他老人家最好的纪念和缅怀,应是要强调一个学习。我总结了几条,不见得深刻和准确,仅供参考吧。

一、学他的松弛。不要小看松弛这两个字,做到了你会所向披靡。你的音色难听,只要松下来,就会让人得到美的享受。严格讲,邱大师音色并不好,但他会用嗓子。邱老师在棚里如同玩一样,心态极放松;而我们有时难免会战战兢兢,思想负担很重。记得有一回,我们几个年轻演员一起到棚里去学身。那是一个美国影片,一个主要演员化装成老太婆,邱老师就配这个“老太”。邱老师见有人观摩,毫无怯场之意,相反与我们谈笑风生,待红灯一亮,迅即进入角色,有声有色



活龙活现(也许因我们在场而更来劲)。我注意到他声音有所变形,把调门拔高了,因原片演员如此,必须贴。长长一场戏,本子握在手上,然他不看本子,一遍就过。结束,回过头来对我们发问:“怎么样?”还能怎么样,绝顶!这一点上,有的人天生松得下来,但对大多数人来说,恐怕是要下下功夫的。

二、学他擅用低调。所谓低调,就是配音时采用的声调比生活中低一个调。外国人说活是这个调,我们当然要跟随着。许多深情的台词,复杂感情的台词,陷入沉思、迷惘的台词,必须用低调甚至更低调来刻画。《白夜》里老年梦想者的愁闷、痛楚和绝望的心态,如不用低调则无从表达。为了区别于青年梦想者的青春和亢奋,低调又形成一种极震撼的对比。我这个人是高亢有余,低音不足。一部日本片《新宿鲨鱼》中我配尽职而不畏死亡的警察,需用极低的语气来说词儿才有威慑力,我就深感吃力。有时低下来了,缺乏足够的音量来支持,更不用说有“水分”了。所以我很佩服邱老师能从容调用低音来塑造角色。

三、学他配角色不雷同。这就跟演戏那样,应努力做到千人千面,人各有貌,而非千人一面。我相信,邱老师也意识到自己嗓音辨识度极高,不雷同不易做到,因此努力在塑造不同角色的气质、个性。他的努力是有效成的。我们都会这样的体验:一开始听他说台词,马上就会叫出来,邱岳峰。但听到第三句第四句,你就会忘掉这是他在配音,而就是这个角色在发言。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在配完“佐罗”后不久,就时想到邱老师,就处处当心不要来“佐罗”,结果觉远和尚就没有带“佐罗”味,再加上几个重场戏格外动情,观众的注意力就不会再停留在这是童自荣上了。

竹制品曾是弄堂人家生活中比比皆是的用品。挑水用的扁担,吃饭的筷子,刷马桶的豁筲,还有淘米箩、蒸笼、晒簾、菜罩、热水瓶壳、油布伞等等。特别是夏日乘风凉,竹椅、竹凳、竹榻、躺椅、竹席等,更是必不可少的。

在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的晚上,人们在家门口乘风凉,悠闲地躺在竹椅竹榻上,摇着蒲扇嘎讪胡。待夜露暗结,又在睡意朦胧中把竹制坐卧器一拾掇回家。竹器碰撞的声音,“明早会、明早会”的招呼声,回想起来是那么温馨。

家里的一根竹扁担,是我童年挑水的专用工具,这是母亲从菜场摊上买来的硬硬的便宜货,挑起来水扁肩。有一次与弟用水桶抬水时,把扁担给压断了,被母亲责骂了一通。一段日子里,只好问邻居借扁担挑水,后来哥从崇明农场带回来一根很有韧性的扁担,挑水

学习邱岳峰

童自荣

京剧演员谁高明,谁是角儿,就是要听他有没有味儿。同样,听配音主要就是要听演员配的味道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,邱老师的艺术功力和造诣登峰造极,无论正面、反面、喜剧色彩的角色,都有极棒的代表作。我最欣赏《简爱》中的罗切斯特——他让你听到角色的绅士及居高临下;欣赏《警察与小偷》中的小偷——他让你听到角色的狡诈又可恨、无奈;欣赏《悲惨世界》中的小店主——他让你听到角色的贪和凶狠。真是味道好极了。追究一下,他的

四、配音又绝非停留在表面,而是真诚地融入角色。我印象深刻地记住他对我说过的话:“想一想,你心里有没有事儿?”可见他自己就是这样动心动情地投入工作的。

生活在生机勃勃地前行,我们共同的事业——翻译片的配音亦是如此。行文至此,不免又联想起回家的问题。我是死脑筋,永嘉路383号是我们曾经的家,我总认为,回这个家不仅可获得一个适宜方便的工作场所,同时又可圆一个梦——建成一个全国性的配音爱好者们的俱乐部,一个面向全国影迷朋友的开放式沙龙。所有拥有翻译片情结的同仁、朋友们,团结起来,为振兴翻译片,加油!



郑辛遥

恩爱夫妻——不是情话多,而是废话多。

小时候,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一天晌午时分,我与外婆正在一起剥毛豆,只见她连连地在叹气。“外婆你有啥不高兴的事吗?”我边把剥好的毛豆放入一个小木碗里,边问道。“唉,”外婆又叹了口气,自言自语地像在问我,“人为什么要死啊?”

印象中,那时的外婆好像是七十几岁了,白皙的脸庞上已有些许鱼鳞般的皱纹,微瘪的嘴巴及稍稍向上翘的下颚,头发梳得油亮发光,据说是用一种叫刨花水涂的,后脑壳盘着一个很精致的小髻,还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。

那个年代已时兴人死火化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外婆在乡下的老家存放着一口品相上佳的楠木棺材。她的儿子、也就是我的舅舅写信来说:“由于老家也在破

怕烫的外婆

杨建明

四旧立四新,村委会的人来咱家那破旧的小矮屋多次了,说要处理这口棺材,因为这是封建迷信的东西。”好在外婆已习惯住在上海的女儿家了,在大城市里或多或少也听到过现在的人去世一律火化,不再睡棺材了。”那口棺材真要处理就处理吧。”她喃喃地说道,“不知人死了,火化烫不烫啊?我可是最怕烫的人呀。”

我在一旁听外婆反反复复自语着,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她。这个话题,我一个小孩怎么能够答得上呢?再说我们又没有死过,就是死过了也不能再说活呀?

一晃好多年过去了,外婆在上海去世后还是被火化了,至于火化时身子到底烫还是不烫,那是谁也不知道的事了。

今年的8月15日是我参军一个甲子的纪念日。我是千千万万退伍兵中普通一员,然而,入伍一甲子纪念日,毕竟是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节点,值得回忆。

60年前,实际年龄不足18岁的我,走出学校,穿上军装,怀着一腔热血奔向军营。新兵连集训时,我被指定为班长。出操、队列训练、生活作息,除了自己一举一动作出表率以外,还要协助管理全班人员,关心他人。有一回出操跑步,我不慎踩到碎玻璃,非但扎穿鞋底,脚底也渗出鲜血,但我未吭声,坚持跑完全程,才去卫生室消毒包扎。首长得知,在当天晚点名时,指名表扬我,新兵就具有“轻伤不下火线”的勇敢精神。

此仅新兵的小小序曲而已,真正的考验来了。分入步兵连队不满一月,全连外出野营拉练,目标枫岭头。虽说节气早已入秋,可江西山道并不好走,上山爬坡,耗费体力可想而知。由于路窄,队伍早变成一路纵队。部队人人全副武装,背包、挎包、武器、弹药,外加颈肩的环形米袋,负重前行。班长、老兵,久经锻炼,步履速度不减。我一个上海入伍的学生兵,便相形见绌了。气喘吁吁不说,背包、装备往下沉,步子迈不开,速度明显慢下来。班长似乎早有准备,命班里个子大、体力壮的两位老兵,分担了我的背包和米袋,可武器、弹药必须自己携带。偏偏连长在前头厉声下令:发现“敌情”,跑步前进!我踉踉跄跄,终于掉队了,甚至产生畏难情绪。幸亏副班长一路跟着我,鼓励帮助我,才坚持到达目的地。晚上全连队在仓库开会,连长在油灯下总结,还不指名、委婉地表扬了我。其实呢,我心里明白,与真正的钢铁战士差距好大呀,特别是思想差距。

诚然,高中文化的城

市兵也有某些长处,比如学习、文体等。班排读报、交流学习心得、给报社写稿;晚点名、军人大会、露天电影前的指挥唱歌等,几乎非我莫属。尤其是我爱好下棋和打乒乓运动,屡次代表连队和团部外出比赛,为部队争得荣誉。有一桩引以自豪的经历值得一提,那就是部队换武器,我当了小教官。一日,连首长把我叫到连部,对我下令:“小陈,你文化高、记忆力好,接受能力强,笔杆子又快,连里命你

你去团集训队学习新式武器,回来教我们全连。”接受此命令,我内心既感激动光荣,又觉责任重大。半月后,我学成归连,上课前一天,我备好教案,将思路理一遍,还在课堂布置好射击学理、分解结合两张挂图,全连干部战士百多号人,齐刷刷坐在下面,听我讲解新武器的性能、原理以及操作要领,并示范表演了新武器的分解结合。一周后,连队顺利上交旧武器,正式使用新武器。我呢,还在日后的训练中,实弹射击名列第一……

戎马倥偬,时光如流。脱下军装的日子里,我时常静思往事。前几年,社区组织给我颁发了“光荣之家”的匾牌。我凝望着匾牌,回眸激情燃烧的岁月,一个信念油然而起:有生之年,当老而弥坚,初心如磐,思想上永远保持兵的本色!



近来常观看南方人录制的有关日常生活的视频,它们所展现的情怀思绪,普通人的追求、失落与欢欣,正体现出南方平民的精神天地。

从全国范围内看,南方人、南方文化,在文艺舞台中心似乎一直在被忽略。这些年来,春晚里的小品成了北方人的天下,南方人偶然在小品中出现,也是小气精明的典型形象。这一心理定势已成了北方观众的精神天平。我记得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刚出版时,并没有获得太大反响,王安忆自己也承认,那时的海派文化研究并没有起来。这20多年来,南方民间文化审美形态才渐渐重新进入了部分人的视野。说是部分人,不妨举个例子。诸君请看这十多年来的电视剧,许多出品方都是南方单位,但为着适应全国观众的文化视野,遵循一种“传统规范”,里面所有人都说着地道的北方话,过着地道的北方生活,甚至喝酒时也常常说“走一个”这种标准的东北话。对这种刻意讨好,全国人民买账吗?我看也未必。

遥想30年前,一部《上海一家人》风靡全国。当时为考虑收视需求,男女主演已启用北方演员,但全剧的美学风格还是江南的,生活习惯是江南的,语言是标准的普通话里夹杂若干上海方言。如若男妈的那声吆喝“桂花赤豆汤”,如若男埋怨赵哥的“你还是那么促狭”——生长在北方、后常年工作在上海的邓云乡先生在谈《红楼梦》时曾这么解释“促狭”:“如‘促狭’二字,便是纯粹的江南话,北京人不但理解其意义,连读音也读不出。照字面按普通话读音读,那就江南人、北京人都听不懂,不能理解了。”但若男就读出了标准的上海话:cuo ke。

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个性并没有受到冷落和排斥,反而由于内在真切自然、细腻流畅的地方风格在全国大受欢迎。

20多年后,正午阳光公司拍摄了《温州一家人》,可那里面哪有温州人日常生活的影子?就连一点讲究意境、推重神似的南方风格都没有。但这样的电视剧,在日下已居然是好剧了。如今,许多南方籍演员不但在南方投资的剧里出演不了主要人物,如姚安濂先生,虽然演技精湛却似乎总在饰演配角;有的还在把口音尽量往北方靠,譬如《大好时光》,故事背景在上海,主演是无锡籍贯、上海出生的胡歌,却听他说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。

我祖籍南方,但是在北京长大的。我常常无由地想起张次溪《北平梨园金石记》有云:“燕京梨园子弟,多来自江南田间,或因避乱,或以年荒,侨居既久,渐成土著。”梅兰芳先生就是这样的土著。可到他这辈,虽已在帝都生活了三代,甚至饮食口味都已入京俗,他的形容举止,还是南方人。他的性子仍是来自长江的:温润如玉、柔中有刚。这就是割不断的文化的“根”。

南方人,是清刚的。就像王安忆说的,南方女人不是黏搭搭的。戴安澜、谢晋元都是南方人,仪表堂堂,为国捐躯。他们不但继承了古人的外表,也继承了古人的清刚。黄裳先生在《一世秋茶说岳王》里,发现“岳王祠庙墓道西侧地下出土了两具石人,我疑心这并非石俑而是早期岳墓前面的翁仲。可他比现存翁仲还要高,身体和面部都是修长的,身前抚着长剑,造型也秀特得多。如果现存翁仲是明代遗物的话,那这两具很可能是宋代的原物。”古南人的长相,我想就是那两具宋翁仲这样的。

不要囿于思维的局限性,不妨先从影视剧开始,为“南方人”正名!

南方人是清刚的

侯宇燕

七夕会

将晾干的竹席收回家,再用井水揩一遍。

家中还有一把油纸伞,几乎陪伴了我的学生时代。油纸伞的伞骨是竹制的,厚厚的油纸裱糊在上面。儿时,在风雨中行,撑着这重重的油纸伞东晃西摇的,有连人带伞被吹着走的感觉。母亲在伞的两头系上一根布绳,让我背着去上学。

竹壳热水瓶也是家家户户必有的。我家台子上常放有四只。偶尔,也会打碎内胆,但竹壳不会坏的。1976年,我去农场也带走了家中一只竹壳热水瓶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会用老虎钳、铁丝等,调换瓶胆下腐烂的底板,去老虎灶泡开水把瓶塞弄丢了,我也会跑到秀水路上的小摊贩处,花两分钱买一只,免得又被母亲一番唠叨。

竹器的年代已经过去,在提倡环保、自然生活的当下,使用竹器,倒是另一种时尚品质了。

竹器的年代

陈建兴

还有毛蚶壳,豁筲一刷,“哗哗”的声响,构成了上海弄堂早晨独有的旋律。刷好的马桶还要晾干,我经常看到弄堂墙角下一排刷好的马桶和马桶豁筲在晾干。为了节约钞票,父亲曾买回一节长竹筒,花了整整一个下午,用柴刀硬生生劈出了一只豁筲。

竹篮子也是弄堂人家过日子少不了的。母亲是杭州人,每次从乡下来总要带上一二只杭州篮回家。新篮子买菜用,旧篮子在家里放杂物。我喜欢拎着杭州篮去菜场买菜,手柄都被我拎出了“包浆”。有时,鸡毛菜上有残余的农药痕迹,我连篮带菜浸到铅桶里,母亲看到,跑上来就给我吃只“毛栗子”,让我把鸡毛菜倒在破篮子里再浸到水中。

盛夏来临,母亲将隔年的竹席拿出来曝晒,还将烧得滚烫的开水浇到竹席的细缝上。傍晚,



边看边聊